

<<中国史纲>>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史纲>>

13位ISBN编号：9787514605945

10位ISBN编号：7514605940

出版时间：2012-11

出版时间：中国画报出版社

作者：张荫麟

页数：239

字数：20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中国史纲>>

前言

自序这部书的开始属草，是在卢沟桥事变之前二年，这部书的开始刊布，是在事变之后将近三年。现在发表一部新的中国通史，无论就中国史本身的发展上看，或就中国史学的发展上看，都可说是恰当其时。

就中国史本身的发展上看，我们正处于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转变关头，正处于朱子所谓“一齐打烂，重新造起”的局面；旧的一切瑕垢腐秽，正遭受彻底的涤荡剜割，旧的一切光晶健实，正遭受天捶海淬的锻炼，以臻于极度的精纯；第一次全民族一心一体地在血泊和瓦砾场中奋扎以创造一个赫然在望的新时代。

若把读史比于登山，我们正达到分水岭的顶峰，无论四顾与前瞻，都可以得到最广阔的眼界。

在这时候，把全部的民族史和它所指向道路，作一鸟瞰，最能给人以开拓心胸的历史的壮观。

就中国史学的发展上看，过去的十来年可算是一新纪元中的一小段落；在这十年间，严格的考证的崇尚，科学的发掘的开始，湮没的旧文献的新发现，新研究范围的垦辟，比较材料的增加，和种种输入的史观的流播，使得司马迁和司马光的时代顿成过去；同时史界的新风气也结成了不少新的，虽然有一部分还是未成熟的果。

不幸这草昧初辟的园林，突遇狂风暴雨，使得我们不得不把一个万果垒垒的时代，期于不确定的将来了。

文献的沦陷，发掘地址的沦陷，重建的研究设备的简陋，和生活的动荡，使得新的史学研究工作在战时不得不暂告停滞，如其不致停顿。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英贤，固尚有之；然而他们生产的效率和发表的机会不得不大受限制了。

在抱残守缺的时日，回顾过去十年来新的史学研究的成绩，把他们结集，把他们综合，在种种新史观的提警之下，写出一部分新的中国通史，以供一个民族在空前大转变时期的自知之助，岂不是史家应有之事吗？

着手去写一部通史的人，不免劈头就碰到一个问题，以批评眼光去读一部通史的人，也不免劈头就碰到同一的问题，那就是，拿什么的“笔削”做标准？

显然我们不能把全部中国史的事实，细大不捐，应有尽有的写进去。

姑勿论一个人，甚至一整个时代的史家没有能力去如此做。

即使能如此做，所成就的只是一部供人检查的“中国史百科全书”，而不是一部供人阅读的中国通史。

那么，难道就凭个人涉览所及，记忆所容，和兴趣所之，以为去取吗？

这虽然是最便当的办法，我怀疑过去许多写通史的人大体上所采的不是这办法。

无怪佛禄德（Froude）把历史比于西方的缀句片，可以任随人意，拼成他所喜欢的字。

我们若取任何几种现行的某国或某处通史一比较，能否认这比喻的确切吗？

但我们不能以这样的情形为满足。

我们无法可以使几个史家各自写成的某国通史去取全同，如自一模铸出，除是他们互相抄袭。

但我们似乎应当有一种标准，可以判断两种对象相同而去取不同的通史，孰为合当，孰为高下，这标准是什么？

读者于此也许会想到一个现成的答案：韩昌黎不早就说过：“记事者必提其要”吗？

最能“提要”的通史，最能按照史事之重要的程度以为详略的通史，就是选材最合当的通史。

“笔削”的标准就在史事的重要性。

但这答案只把问题藏在习熟的字眼里，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

什么是史事的重要性？

这问题殊不见得比前一问题更为浅易。

须知一事物的重要性或不重要性并不是一种绝对的情实，摆在该物的面上，或蕴在该物的内中，可以仅就该事物的本身检察或分析而知的。

<<中国史纲>>

一事物的重要性或不重要性乃相对于一特定的标准而言。

什么是判别重要程度的标准呢？

“重要”这一概念本来不只应用于史事上，但我们现在只谈史事的重要性，只探究判别史事的重要程度的标准。

“重要”一词，无论应用于日常生活上或史事的比较上，都不是“意义单纯”（Univocal）的；有时作一种意义，有时作另一意义；因为无论在日常生活上或史事的比较上，我们判别重要程度的标准都不是独一无二的；我们有时用这标准，有时用那标准。

而标准的转换，我们并不一定自觉。

唯其如此，所以“重要”的意义甚为模糊不清。

在史事的比较上，我们用以判别重要程度的可以有五种不同的标准。

这五种标准并不是作者新创出来的，乃是过去一切通史家部分地、不加批判地、甚至不自觉地，却从没有严格的采用的。

现在要把他们尽数列举，并加以彻底的考验。

第一种标准可以叫做“新异性的标准”（Standard of Novelty）。

每一件历史的事情都在时间和空间里占一特殊的位置。

这可以叫做“时空位置的特殊性”。

此外它容有若干品质，或所具若干品质的程度，为其他任何事情所无。

这可以叫做“内容的特殊性”。

假如一切历史的事情只有“时空位置的特殊性”而无“内容的特殊性”，或其“内容的特殊性”微少到可忽略的程度，那么，社会里根本没有所谓“新闻”，历史只是一种景状的永远持续，我们从任何一历史的“横剖面”可以推知其他任何历史的“横剖面”。

一个民族的历史假若是如此，那么，它只能有孔德所谓“社会静力学”，而不能有他所谓“社会动力学”；那么，它根本不需用写的历史，它的“社会静力学”就可以替代写的历史。

现存许多原始民族的历史虽不是完全如此，也近于如此；所以它们的历史没有多少可记。

我们之所以需要写的历史，正因为我们的历史绝不是如此，正因为我们的史事富于“内容的特殊性”，换言之，即富于“新异性”。

众史事所具“内容的特殊性”的程度不一，换言之，即所具“新异性”的程度不一。

我们判断史事的重要性的标准之一即是史事的“新异性”。

按照这标准，史事愈新异则愈重要。

这无疑地是我们有时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所采用的标准。

关于这标准有五点须注意。

第一，有些史事在当时富于“新异性”的，但后来甚相类似的事接叠发生，那么，在后来这类事便减去新异性；但这类事的始例并不因此就减去“新异性”。

第二，一类的事情若为例甚稀，他的后例仍不失其“新异性”，虽然后例的新异程度不及始例。

第三，“新异性”乃是相对于一特殊的历史范围而定。

同一事情，对于一民族或一地域的历史而言，与对于全人类的历史而言，其新异的程度可以不同。

例如十四世纪欧洲人之应用罗盘针于航海，此事对于人类史而言的新异程度远不如其对于欧洲史而言的新异程度。

第四，“新异性”乃是相对于我们的历史知识而言。

也许有的史事本来的新异程度很低，但它的先例的存在为我们所不知。

因而在我们看来，它的新异程度是很高的。

所以我们对于史事的“新异性”的见解随着我们的历史知识的进步而改变。

第五，历史不是一盘散沙，众史事不是分立无连的；我们不仅要注意单件的史事，并且要注意众史事

<<中国史纲>>

所构成的全体；我们写一个民族的历史的时候，不仅要注意社会之局部的新异，并且要注意社会之全部的新异；我们不仅要注意新异程度的高下，并且要注意新异范围的大小。

“新异性”不仅有“深浓的度量”（Intensive Magnitude），并且有“广袤的度量”（Extensive Magnitude）。

设如有两项历史的实在，其新异性之“深浓的度量”可相颉颃，而“广袤的度量”相悬殊，则“广袤的度量”大者比小者更为重要。

我们的理想是要显出全社会的变化所经诸阶段和每一段之新异的面貌和新异的精神。

假如我们的历史兴趣完全是根于对过去的好奇心，那么，“新异性的标准”也就够了。

但事实上我们的历史兴趣不仅发自对过去的好奇心，所以我们还有别的标准。

第二种标准可以叫做“实效的标准”（Standard of Practical Effect）这个名词不很妥当，姑且用之。

史事所直接牵涉和间接影响于人群的苦乐者有大小之不同。

按照这标准，史事之直接牵涉，和间接影响于人群的苦乐愈大，则愈重要。

我们之所以有这标准，因为我们的天性使得我们不仅关切于现在人群的苦乐，并且关切于过去人群的苦乐。

我们不能设想今后史家会放弃这标准。

第三种标准可以叫做“文化价值的标准”（Standard of Cultural Values）。

所谓文化价值即是真与美的价值。

按照这标准，文化价值愈高的事物愈重要。

我们写思想史文学史或美术史的时候，详于灼见的思想而略于妄诞的思想，详于精粹的作品而略于恶劣的作品（除了用作形式的例示外），至少有一大部分理由依据这标准。

假如用“新异性的标准”则灼见的思想和妄诞的思想，精粹的作品和恶劣的作品，可以有同等的新异性，也即可以有同等的重要性，而史家无理由为之轩轻。

哲学上真的判断和文学美术上比较的美的判断，现在尚无定论。

故在此方面通史家容有见仁见智之殊。

又文化价值的观念随时代而改变，故此这标准也每随时代而改变。

第四种标准可以叫做“训诲功用的标准”（Standard of Didactic utility）。

所谓训诲功用有两种意义：一是完善的模范；二是成败得失的鉴戒。

按照这标准，训诲功用愈大的史事愈重要。

旧日史家大抵以此标准为主要的标准。

近代史家的趋势是在理论上要把这标准放弃，虽然在事实上未必能彻底做到。

依作者的意见，这标准在通史里是要被放弃的。

所以要放弃它，不是因为历史不能有训诲的功用，也不是因为历史的训诲功用无注意的价值，而是因为学术分工的需要。

例如历史中的战事对于战略与战术的教训，可属于军事学的范围；历史人物之成功与失败的教训，可属于应用社会心理学中“领袖学”的范围。

第五种标准可以叫做“现状渊源的标准”（Standard of Genetic Relation With Present Situations）。

我们的历史兴趣之一是要了解现状，是要追溯现状的由来，众史事和现状之“发生学的关系”（Genetic Relation）有深浅之不同，至少就我们所知是如此。

按照这标准，史事和现状之“发生学的关系”愈深则愈重要，故近今通史家每以详近略远为旨。

然此事亦未可一概而论。

历史的线索，有断而复续的，历史的潮流，有隐而复显的。

随着社会当前的使命，问题，和困难的改变，久被遗忘的史迹每因其与现状的切合而复活于人们的心中。

例如吾人今日之于墨翟、韩非、王莽、王安石，与钟相是也。

<<中国史纲>>

以上的五种标准，除了第四种外，皆是今后写通史的人所当自觉地，严格地，合并采用的。不过它们的应用远不若它们的列举的容易。

由于第三种标准，对文化价值无深刻的认识的人不宜写通史。

由于第五种标准“知古而不知今”的人不能写通史。

再者要轻重的权衡臻于至当，必须熟习整个历史范围里的事实。

而就中国历史而论，这一点决不是个人一生的力量所能做得到的。

所以无论对于任何时代，没一部中国通史能说最后的话。

所以写中国通史永远是一种极大的冒险。

这是无可如何的天然限制，但我们不可不知有这种限制。

除了“笔削”的标准外，我们写通史时还有一个同样根本的问题。

经过以上的标准选择出来的无数史实，并不是自然成一系统的。

它们能否完全被组织成一系统？

如是可能？

这是什么样的系统？

上面说过，众史事不是孤立无连的。

到底它们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

同时的状况，历史的“横切片”的种种色色，容可以“一个有结构的全体之众部分的关系”（Relation between parts of an organized whole）的观念来统驭。

但历史不仅是一时的静的结构的描写，并且是变动的记录。

我们能否或如何把各时代各方面重要的变动的事实系统化？

我们能否用一个或一些范畴把“动的历史的繁杂”（changing Historical Manifold）统贯？

如其能之，那个或那些范畴是什么？

我们用来统贯“动的历史的繁杂”可以有四个范畴。

这四个范畴也是过去史家自觉或不自觉地部分使用的。

现在要把它们系统地列举，并阐明它们间的关系。

（甲）因果的范畴。

历史中所谓因果关系乃是特殊的个体与特殊个体间的一种关系。

它并不牵涉一条因果律，并不是一条因果律下的一个例子。

因为因果律的例子是可以复现的；而历史的事实，因其内容的特殊性，严格地说，是不能复现的。

休谟的因果界说不适用于历史中所谓因果关系。

（乙）发展的范畴。

就人类史而言，因果的关系是一个组织体对于另一个组织体的动作，或一个组织体对其自然环境的动作，或自然环境对一个组织体的运用（Action）或一个组织中诸部分或诸方面的交互动作（Interaction）。

而发展则是一个组织体基于内部的推动力而非由外铄的变化。

故此二范畴是并行不悖的。

发展的范畴又包括三个小范畴。

（1）定向的发展（Teleological Development）。

所谓定向的发展者，是一种变化的历程。

其诸阶段互相适应，而循一定的方向，趋一定鹄的者。

这鹄的不必是预先存想的目标，也许是被趋赴于不知不觉中的。

这鹄的也许不是单纯的而是多元的。

（2）演化的发展（Evolutional Development）。

所谓演化的发展者，是一种变化的历程，在其所经众阶段中，任何两个连接的阶段皆相近似，而其“作始”的阶段与其“将毕”的阶段则剧殊。

其“作始”简而每下愈繁者谓之进化。

其“作始”繁而每下愈简者谓之退化。

<<中国史纲>>

(3) 矛盾的发展 (Dialectical Development)。

所谓矛盾的发展者，是一变化的历程，肇于一不稳定组织体，其内部包含矛盾的两个元素，随着组织体的生长，它们间的矛盾日深月显，最后这组织体被内部的冲突突破而转成一新的组织体，旧时的矛盾的元素经改变而潜纳于新的组织中。

演化的发展与定向的发展，矛盾的发展与定向的发展，各可以是同一事情的两方面。

因为无论演化的发展或矛盾的发展，都可以冥冥中趋赴一特定的鹄的。

惟演化的发展与矛盾的发展则是两种不同的事情。

这四个范畴各有适用的范围，是应当兼用无遗的。

我们固然可以专用一两个范畴，即以之为选择的标准，凡其所不能统贯的认识为不重要而从事舍弃。

但这办法只是“削趾适履”的办法。

依作者看来，不独任何一个或两三个范畴不能统贯全部重要的史实；便四范畴兼用，也不能统贯全部重要的史实，更不用说全部的史实，即使仅就一个特定的历史范围而论。

于此可以给历史中所谓偶然下一个新解说，偶然有广狭二义：凡史事为四范畴中某一个范畴所不能统贯的，对于这范畴为偶然，这偶然是狭义的偶然；凡史事为四范畴中任何范畴所不能统贯的，我们也说它是偶然，这偶然是广义的偶然。

历史中不独有狭义的偶然，也有广义的偶然。

凡本来是偶然（不管狭义或广义的）的事，谓之本体上的偶然。

凡本非偶然，而因我们的知识不足，觉其为偶然者，谓之认识上的偶然。

历史家的任何是要把历史中认识上的偶然尽量减少。

到此，作者已把他的通史方法论和历史哲学的纲领表白。

更详细的解说不是这里篇幅所容许。

到底他的实践和他的理论相距有多远，愿付之读者的判断。

二十九年二月昆明张荫麟初版自序作者写此书时所悬鹄的如下：（1）融会前人研究结果和作者玩索所得，以说故事的方式出之，不参入考证，不引用或采用前人叙述的成文，即原始文件的载录亦力求节省；（2）选择少数的节目为主题，给每一所选的节目以相当透彻的叙述，这些节目以外的大事，只概略地涉及以为背景；（3）社会的变迁，思想的贡献，和若干重大人物的性格，兼顾并详。

至于实际成就与所悬鹄的之间，有多少距离，只好付之读者的判断了。

这部书原不是作者创意要写的。

创意要写这部书并且给他以写这部书的机会的是傅孟真先生和钱乙藜先生。

往在昆明，黄子坚先生孙毓棠先生曾费心谋刊印此书而未成。

比来遵义，张晓峰先生主国立浙江大学史地教育研究室，为石印五百册以广其传。

以上诸先生，作者谨于此志谢。

三十年三月于贵州遵义书张荫麟再版自序此书再版和初版不同的地方，除多处笔误和刊误的校正，数处小节的增删外，乃是第九至第十一章的添入。

第九章的上半作者自觉尚有缺点，却不及修正，读者谅之。

初版的校正，幸得柳定生女士及叶文培君的助力，合于此志谢。

三十一年九月张荫麟于贵州遵义书

<<中国史纲>>

内容概要

张荫麟先生的《中国史纲》是与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吕思勉先生的《中国通史》并肩的史学经典。

本书原为历史教材，张先生用讲故事的方式写出中国社会的变迁、文化的发展、思想的贡献及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的偶然性与必然性。

<<中国史纲>>

作者简介

张荫麟(1905年~1942年),字素痴,广东东莞人。
著名学者,历史学家。
早年就学于清华大学,后留学美国,获斯坦福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曾任教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讲授历史、哲学课。
除史学外,在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方面都有相当建树。
著作有《中国史纲》、
《张荫麟文集》等。

<<中国史纲>>

书籍目录

- 自序
- 初版自序
- 再版自序
- 第一章 中国史黎明期的大势
 - 第一节 商代文化
 - 第二节 夏商大事及以前之传说
 - 第三节 周朝的兴起
 - 第四节 周代与外族
- 第二章 周代的封建社会
 - 第一节 封建帝国的组织
 - 第二节 奴隶
 - 第三节 庶民
 - 第四节 都邑与商业
 - 第五节 家庭
 - 第六节 士
 - 第七节 宗教
 - 第八节 卿大夫
 - 第九节 封建组织的崩溃
- 第三章 霸国与霸王
 - 第一节 楚的兴起
 - 第二节 齐的兴起（附宋）
 - 第三节 晋楚争霸
 - 第四节 吴越代兴
 - 第五节 郑子产
- 第四章 孔子及其时世
 - 第一节 鲁国的特色
 - 第二节 孔子的先世与孔子的人格
 - 第三节 孔子与其时世
 - 第四节 孔子与政治
 - 第五节 孔子与教育
 - 第六节 孔子的晚年
- 第五章 战国时代的政治与社会
 - 第一节 三晋及田齐的兴起
 - 第二节 魏文侯李克吴起
 - 第三节 秦的变法
 - 第四节 经济的进步与战争的变质
 - 第五节 国际局面的变迁
- 第六章 战国时代的思潮
 - 第一节 新知识阶级的兴起
 - 第二节 墨子
 - 第三节 墨子与墨家
 - 第四节 孟子许行及周官
- 第五章 杨朱陈仲庄周惠施老子
- 第六章 邹衍荀卿韩非
- 第七章 秦始皇与秦帝国

<<中国史纲>>

- 第一节 吕不韦与嬴政
- 第二节 六国混一
- 第三节 新帝国的经管
- 第四节 帝国的发展与民生
- 第八章 秦汉之际
- 第一节 陈胜之起灭
- 第二节 项羽与巨鹿之战
- 第三节 刘邦之起与关中之陷
- 第四节 项羽在关中
- 第五节 楚汉之战及其结局
- 第九章 大汉帝国的发展
- 第一节 纯郡县制的重建
- 第二节 秦汉之际中国与外族
- 第三节 武帝开拓事业的四时期
- 第四节 武帝的新经济政策
- 第十章 汉初的学术与政治
- 第一节 道家学说的全盛及其影响
- 第二节 儒家的正统地位之确立
- 第三节 儒家思想在武帝朝的影响
- 第十一章 改制与“革命”
- 第一节 外戚王氏的专权
- 第二节 哀帝朝的政治
- 第三节 从王莽复起至称帝
- 第四节 王莽的改革
- 第五节 新朝的倾覆
- 第六节 东汉的建立及其开国规模

<<中国史纲>>

章节摘录

第一章中国史黎明期的大势从前讲历史的人每喜欢从“天地剖判”或“混沌初开”说起。

近来讲历史的人每喜欢从星云凝结和地球形成说起。

这部书却不想拉得这么远。

也不想追溯几百万年以前，东亚地方若干次由大陆变成海洋，更由海洋变成大陆的经过。

也不想追溯几十万年前当华北还没有给飞沙扬尘的大风铺上黄土层的时候，介乎猿人与人之间的“北京人”怎样在那里生活着，后来气候又怎样改变，使得他们消灭或远徙，而遗留下粗糙的石器，用火的痕迹，和食余的兽骨人骨，在北平附近的周口店的地层中。

也不想跟踪此后石器文化在中国境内的分布，传播和进步，直至存在于公元前六七千年间具有初期农业和精致陶器的“仰韶文化”（仰韶在河南渑池附近）所代表的阶段。

这部中国史的着眼点在社会组织的变迁，思想和文物的创辟，以及伟大人物的性格和活动。

这些项目要到有文字记录传后的时代才可得确考。

严格地说，照现在所知，我国最初有文字记录的时代是商朝，略当于公元前十八世纪中叶至十二世纪中叶。

本书即以商朝为出发点，然后回顾其前有传说可稽的四五百年，即以所知商朝的实况为鉴别这些传说的标准。

第一节商代文化商朝在最后的二百七十多年间，定都于殷，即今河南安阳，故此商朝又名殷朝。

我们称这二百七十多年为商朝的后期，我们所以确知商朝已有文字记录乃因为公元1899年以来殷都遗址——即所谓殷墟——的发现和发掘。

殷墟出土的遗物，除了大批的铜器、陶器、骨器、石器外，最引史家注意的是无数刻有文字的龟甲和兽骨（至少有十万片以上）。

这些甲骨差不多全是占卜所用的，乃王室卜人所保存的档案。

原来商人要预测未来的吉凶，或探问鬼神的意旨，便拿一块龟腹甲（间有用背甲的）或牛肩胛骨（间有用肋骨的），在一面加以钻凿，却不令穿透，然后在钻凿处灼火，另一面便现出裂纹，这叫做“兆”。

卜人看兆而断定鬼神或一种神妙的势力对于所问的反应。

所问的事情，有时连日后的“应验”，就刻在兆的旁边，这可称为卜辞。

卜辞的内容以关于祖先的祭祀的为最多，如卜祭祀的日期、用牲的种类、用牲的数目等；有关于气象的，如卜雨、晴、风、雪等；有关于岁收的丰歉的；有关于征伐、渔猎和出行涉川之利否的；有关于疾病、胎孕和梦征的；有所谓卜旬和卜夕的，即于一旬之末卜下一旬有无灾害，和于日间卜是夕有无灾害的。

还有别的事项这里不能尽举。

卜辞以外，甲骨文书中也有少数短短的记事，例如记颁发矛若干，某人取贝若干，某日某人入觐之类；又有田猎获兽的记录，刻在兽头骨上的。

甲骨文书全是商朝后期的遗物。

根据甲骨文书、甲骨文字的分析、其他商代的遗物遗迹和后人关于商朝的记载，我们可作一商代的文化速写如下。

商人是以农业为主要的生产方法。

农作物有黍、稷、稻、麦、蚕桑。

卜辞中“卜黍年”、“贞（卜问）我受黍年”、“贞其登黍”的记录很多，而此等处的黍字从未见有用别的植物名来替代的，可知黍为商人主要的农作物。

帛、巾、幕等字和若干从“糸”的字的存在，证明丝织工艺的发达。

有酒，以黍酿造。

耕种全用人力。

农具有耒耜。

<<中国史纲>>

原始的耒耜，盖全以木为之。

耒是一根拗曲的木棒，下端歧而为二，歧头上安一横木，以便脚踏。

这是起土用的。

耜和耒的分别是下端斜锐而不分歧，利于刺地而不利起土，大约过于坚实的土，耒不能起便先用耜去刺松。

耒当是利用树桠做成。

商人是否已用铜做耒耜的下部，不得而确知。

渔猎和畜牧也是商人的盛大的生产副业。

鱼的种类不见于卜辞。

猎品，除野猪、鹿、狼、兕、兔、雉外，还有象。

商王田猎的记录中，获鹿有一次三百八十四头的，获猪有一次一百十三头的，获狼有一次四十一头的。

可见殷都附近的开辟程度。

供食的家畜，除牛、羊、鸡、豕外，还有狗。

牧畜业之盛从王室祭祀用牲之多可见，每有一次用牛羊三四百头的。

驯役的动物除牛（旱牛和水牛）、马、犬外，还有象。

至迟在商朝末年，商人并且曾利用象去作战。

商人已有铸造青铜（铜锡合金）器的工艺，铸造工场的遗物曾在殷墟找得，有可容铜液十二三公斤的陶制炼锅，有铜制的型范，有铜矿石，有炼渣。

商人的兵器及工具大部分已用铜制，但也有一部分仍用石或骨角制。

殷墟遗物中有铜制的戈头、矛头、瞿、箭镞、铍、小刀、针；石制的矛头、枪头、箭镞、刀、斧、粟齿；牛角或鹿角制的矛头、箭镞和骨锥。

骨角制的兵器也许是仅作明器用的。

商人铸铜技术之最高的造就，乃在王宫和宗庙里所陈列的供饮食和盛载用的种种器皿，如尊、卣（盛酒用）、爵（酌酒用）、觚（饮器）、壘、（食器）、方彝、巨鼎（盛食物用）等等，都是具有很绚丽的花纹的。

可惜写此段时，殷墟的铜器，作者尚无缘寓目。

兹根据他人参观（民二十六年夏教育部第二次全国美术展会所陈列者）的报告，略记二器，以见一斑。

一为提梁卣：器分三层，上层为一盖，以练系于梁间，下层为卣的本身，中层搁上是一盖，取下来却是一觚，提梁的两端，各有一生动的兔形的兽头，全器周围是细致的花纹。

一为盂形的器：当中有一柱，柱顶成莲花形，其旁四龙拱绕，两龙锐角，两龙钝角，四龙相连，可以环柱为轴而旋转，盂身和柱周围也是细致的花纹。

此外殷墟铜器之可注意的有盘、壶、铲、勺、漏勺、筷子等，还有战士戴的盔。

殷墟的陶器包括种类繁多的饮器、食器、盛器和烹饪器，其质地有灰色、红色的粗陶，黑色、白色的细陶和一种经高度烧加釉的陶；其纹饰多数是刻划的。

细陶的纹饰极复杂，其母题有动物形，几何图案和图案化的动物形。

商人牙、骨、玉、石雕刻工艺在殷墟的遗迹也很丰富，举其特别可注意的：有镶嵌绿松石的象牙鸱尊；有一种雕纹的（也有绘纹的）骨制玩器，仿佛后世“如意”一类的东西，长形略曲，其花纹为龙、凤或蝉形，偶或嵌着绿松石；有各种式的佩玉，或作圆圈，或作半圆，或作长筒，或双龙相对成一圆形，或两鱼相对成一半圆，或状人物、人面、兽头、虎、兔、象、鸱、燕、鸽、鱼、蛙、蝉、长尾鸟、蝙蝠等；又有巨大的大理石的立体雕刻品，状人物、虎、龟、鸱、蟾、双兽等，以供陈设之用的。

从状人物的雕刻品和其他遗物，我们知道商人是席地而坐的；知道当时一部分人的服装是交领、右衽、短衣、短裙、束带、其鞋翘尖；知道当时女人脸上涂朱；头饰极复杂，左右两鬓或额间的头巾上缀一绿松石砌成的圆形物；头发中间束一骨圈；发上戴雕纹嵌绿松石的象牙梳；又簪骨制或玉制的笄，小的一两枝，多的几十枝；笄头雕各式各样的（现已发现四五十种）兽头和花纹；她的头饰比头还高

<<中国史纲>>

。关于商人的居室，我们也有一些推想的根据。有殷墟曾发现版筑的遗迹，那是房屋的基址。有一处基址作长方形，四围有许多大石卵，其相互间的距离，大略相等。这些石卵大约就是柱础，原来上面是安柱的。有一基址长三十公尺，宽九公尺，石柱础之外，并有铜柱础十个。殷墟绝无砖瓦，房顶想必是用茅草编成的。古人所谓“茅茨土阶”，大约就是商朝宫殿的写照。又发现一座纯黄土筑成的大台基，面向正南，与罗盘所指的完全相合。台基前十九公尺，也有大石卵，排成弓背形。台基的四周，遗下好些整副的野猪骨，可见这建筑必是和祭祀有关的。又掘出若干长方形的坎穴，有阶级可上下，中有破陶片牛骨狗骨之类。坎穴内周围用硬土筑成，铁一般坚固。有些坎穴之下又套一个坎穴。这些坎穴是否与上说的版筑柱础同时，不能确定。但我们知道，远距商朝亡后三四百年，还有贵族的地下宫室见于记载（《左传》），则商朝后期之有这种穴居是很可能的。殷墟又掘出一些商王的陵墓。从墓室的情形可以推知王宫内部的情形。墓室一律作亚字形，原是木构，木料已腐化无存，却剩下木构上所装的各种立体石雕，作兽头、双面、牛头、鸟、兽等形的。又从墓中的遗迹推之，可知原来墙壁的内面是嵌镶着许多纹饰和涂着红色的。商人的交通用具，有牛、马、牛马或象驾的车。除普通的车外，又有兵车，其形式大略是舆作半圆形，由后升降，一辕驾四马，两服两骖，与后来周朝的兵车无多差异；这是从殷墟发现的铜质车饰推知的。据卜辞的记载，商人出征有时远行至三四十日。上面讲的是商人的“物质文明”。其次要讲他们的社会组织，可惜后者的资料远不如前者的详晰。商人是普遍地聚族而居的，而且每族自成为一社会的单位。每族有一名号，即所谓“氏”。所以后来商朝亡后，新朝把商遗民分派给新封的诸侯都是整族整族地分派的：例如以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等六族分给鲁国；以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等七族分给卫国。卜辞记商人用兵，每有派某一族或某些族的人去作战的；例如“令旻族寇周”，“令多（众）子族从犬侯寇周”，“命五族伐羌”等。姓和氏的分别，商朝当已有之。姓是旧有的族号，氏是比较后起的族号。因为族人的繁衍，一族可以分成许多族，而散居异地。同源异流的众族保留其旧有共同的族号，谓之姓；同时各有其特殊的族号，谓之氏。姓字甲骨文及周金文皆作生，不从女。以生为姓者，溯生之所从来也。（古人名与姓氏不并举，因为在比较原始的社会里，互相接触的人，以同姓氏为常，自无以姓氏冠其名上之必要。此种习惯直至春秋时代犹然。以姓氏冠名乃是有了五方杂处的大都市以后的事。）商民族以一个王室和它的都邑为核心。这都邑商人自称“天邑商”。

<<中国史纲>>

在商朝六百年间，这“天邑商”曾经六次迁徙，最初是在亳，即今河南商丘北四十里；中间五迁皆不出今山东的南半和河南的东半；最后的二百七十余年是在殷，即安阳的殷墟。

商王统属着许多部族的君长，即他的“诸侯”。

原则上他们对商王的主要义务，是当他需要时，派兵去助他或替他征战，此外也许还有定期的贡献。这些诸侯的来源，大抵是本来独立部族的君长，为商王所征服的，或震于商朝的威势而自愿归服的；似乎还有一部分是商王把田邑分给自己的臣下或亲族而建立的。

商王对各诸侯的控制能力并不一致，诸侯对商朝也叛服不常，他们彼此间也不永远是和平的友邻。

卜辞里每有商王命这个诸侯去伐那个诸侯的记载。

诸侯领土与王畿之间，民族和文化的关系疏密不一。

有些诸侯所领的部族与王畿的人民是属同一民族，或原来虽不属同一民族，而已经与商人同化的，这些可以概称为商人；但也有些诸侯所领的部族在语言习惯上皆与商人相异，而始终对商人保存着“非我族类”之感的，例如当商朝末年居于泾渭流域的周人。

商朝王位的继承，自第二传以下，以兄终弟及为原则。

王子无嫡庶之分，皆有继位的资格。

至无弟可传，然后传子。

但传末弟之子抑传其先兄之子，似无定制；多数是传末弟之子，但有不少例外。

每因堂兄弟争位酿成王室的大乱。

最后的四传皆是以子继父，似乎已鉴于旧制的不善而有意把它改革了。

诸侯的继承法是否也以兄终弟及为原则，无从知道，但至少例外，如“周侯”的继承，始终是以子继父的。

在商朝的势力范围以内和以外散布着许多文化远较商人落后的游牧民族，不时寇略商朝或其诸侯的领域。

商朝后期的最大外敌是西北的鬼方（其根据地盖在山西北部及陕西的北部和西部）。

历史上记载商王武丁曾对他用兵至三年之久。

此外卜辞所记商人的外敌还有好些，但其中除羌人外都与后来的历史失了连络。

卜辞所记商人对外战争，用兵至多不过四千、五千，俘虏至多不过十五、十六，但这些似乎不能作代表的例，因为卜辞曾记一次杀敌二千六百五十六人。

战争所获的俘虏，当有一部分是用作祭祀的牺牲，卜辞中屡有人祭的记录。

但那不是常见的事。

大多数俘虏当是用作奴隶。

卜辞中有奴、奚、臣、仆等字皆是奴隶之称。

奴隶除用执贱役外，当亦用于战争，卜辞中有“呼多臣”伐某方的记录，似是其证。

又有所谓“藉臣”和“小藉臣”，似是奴隶之用于耕作的。

商人的商业已发展到使用货币的阶段，他们的货币以一种咸水贝为之，小块的玉器似乎也用为货币。

从殷墟的遗物可以推知殷都一带商业之盛，铜器、玉器和绿松石饰品的原料都非近地所有；占卜用的消费量甚大的龟也是异地所产；咸水贝也是如此。

特别是玉和贝必定是从远方辗转贩运而来的。

关于商人的社会状况，我们所知仅此。

其次要估量他们表现于生产方法以外的智力。

甲骨文书包涵单字约五千，可识的约一半。

这些文字虽然形体上与今字大异，但已识的字都可依照一定规则译成今字。

其意义及用法大体上与今字不殊，习惯的保守性真是可惊的。

除形体外，甲骨文字与今字的差异有两点可注意：（一）带有图象性的字无论物体的写生或动作性态的喻示，每随意描写，但求肖似，没有定构。

例如龟字，或画正面，或画侧面，或画尾，或不画尾，或画两足，或画一足。

又如渔字，或画一鱼、一网、一手，或只画一鱼、一手，或画四鱼在水中，或画一鱼傍水。

（二）在意义的分别上，有好些地方比今字为详细。

<<中国史纲>>

例如驾馭之馭，或从马，或从象，因所馭不同而异字；又如牧字，或从牛，或从羊，因所牧不同而异字；又如一兽的雌雄，各有异名；牝牡二字原指牛的两性，此外马、羊、豕、犬、鹿等，各于本字的边旁或底下加七或土，以别雌雄。

现存商人的文书只有契刻的甲骨文书。

但商人所有的文书不只此种。

甲骨文书是先写而后刻的。

这从甲骨上一些写而漏刻的朱墨迹可以推知。

殷墟又发现一块白陶上写着字。

从这些字迹可以推知毛笔的存在。

又甲骨文中有所字，象竹简汇集之形。

既有笔又有简册，可知当有写在简册上的文书。

现存荟聚上古文件的《尚书》中，传说为商朝遗文的有五篇。

其中比较可信为真出商人手笔的是《盘庚》三篇，那是记商王盘庚迁都（自奄，即今山东曲阜，迁殷。

）前后对臣民三次训话的。

古代记载原有“商人尚鬼”的话，证以卜辞而知其确切。

在商人看来，神鬼的世界是和有形的世界同样地实在，而且这两个世界关系极密切。

鬼神充斥于他们的四周，预知他们自身及其环境的一切变动，操纵着他们的一切利害吉凶祸福，需要他们不断的馈飧和贿赂。

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每遇有可容犹豫的事情或不能解答的疑问，照例要听命于龟壳和牛骨。

神鬼世界的主要成分是他的祖先。

王室对祖先的祭祀，其名目之众多，次数之频繁，供献之丰盛都非我们所能想象。

用牲的数目有多至一次五十羊、三百牛，或四百牛的。

用牲的方法，除置俎中蒸熟或当场生宰以供陈列外，有以火焚烧，或沉于水中，或埋入土中的。

祭祀的时日，用牲的种类、数目、方法，有时连牝牡、毛色，都要凭卜人预先向所祀的祖先请示。

商人心目中死鬼与现世的关系，从盘庚迁都前对臣民的第二次训词（即《盘庚》中篇所记）很可以看出。

兹将其中一段的大意，译白如下：“我念着先王为你们的先人劳碌，就关心你们，要保育你们。

我若有失政，先王就要重责我说：为什么虐待我的子民？

你们若不知去求安乐的生活，不与我同心，先王便要责罚你们：为什么不和我的幼孙和好？

……你们若立心不良，先王便要革了你们的先祖先父在天的职位。

你们的先祖先父受了你们的牵累就要弃绝你们，不救你们的死亡了。

我有了这样乱政的臣民，只得拿贝和玉去祈祷。

你们的先祖先父便会告诉先王：惩罚我的子孙罢！

于是先王便大大地降下不祥来了！

“祖先而外，商人的神祇，以现在所知，有主土壤的社神，有山川之神，有风雨之神，有蚕神，还有主宰百神的“帝”，即上帝。

风神就是上帝的使者，他是凤鸟。

卜辞中风与凤同字。

商人不知有没有占星术，但他们已会观察天象而定历法。

他们的历法大致与旧时的阴历相同：一年为十二月，月有大小，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有闰月，置于年终，称为十三月。

商人的乐器有磬、埙（有石制、陶制、骨制三种）、鼓、饶（形如铃铎而无舌，持以敲击，大小三枚为一套）、龠（笙之小者）。

又卜辞中有从丝从木的樂（乐）字，可见琴瑟之类当时亦已存在。

商代文化的速写止此。

第二节夏商大事及以前之传说商朝从成汤创业以后，六百年间，可考的大事，除了六次迁都，除了对

<<中国史纲>>

鬼方的大战，除了最后直接间接和亡国有关的打击外，便是五度由盛而衰的循环。所谓盛就是君主英武诸侯归服，所谓衰就是君主昏暗，或王室内乱，而诸侯叛离。前期第一度的盛衰牵涉到汤孙太甲（商朝第四王）和汤的开国功臣伊尹的关系。

这有二说。

一说太甲无道，“颠覆汤之典型”，伊尹把他放逐于桐，过了三年，伊尹见他悔过修德，又迎他复位。

一说伊尹于商王仲壬死后，把法当嗣位的太甲放逐于桐，而自即王位；其后七年，太甲自桐潜出，杀伊尹。

肇始商朝后期的盘庚是一中兴之主。

在他以后，惟他的侄子武丁曾一度中兴。

武丁以降，商朝一直衰下去。

继位的君主皆生长安逸，“不知稼穡之艰难，惟耽乐之从”（这是周朝开国元勋周公追数前朝衰亡的原因的话）。

他们以畋游荒宴代替了国政的烦劳。

在商朝末年，一种叔世的颓废和放纵弥漫了整个商人社会。

狂饮滥醉的风气普遍于君主、贵族和庶民。

这是他们亡国的主因。

在叙述商朝灭亡的经过之前，让我们回溯商朝所继承的历史线索。

商朝所替换的朝代是夏。

关于夏朝，我们所知，远更模糊。

例如夏朝已有没有文字？

有没有铜器？

其农业发展到什么程度？

其政治组织与商的异同如何？

这些问题都无法回答。

在后入关于夏朝的一切传说和追记中，我们所能抽出比较可信的事实，大要如下。

夏朝历年约莫四百。

其君位是父死子继而不是兄终弟及。

其国都的迁徙比商朝更为频数。

最初的君主禹历都阳城、晋阳、安邑，皆不出今山西的西南角（阳城在翼城西，晋阳在临汾西，安邑在平陆东北）。

禹子启始渡河而南，居今新郑、密县间。

以后除启孙后相因外患失国远窜外，夏主的迁徙，不出今河南的黄河以南、汝、颍以北。

当夏朝为成汤所灭时，都于斟。

即今河南巩县西南。

夏朝最大的事件是与外族有穷氏的斗争。

有穷氏以钜（今河南滑县东）为根据地，当启子太康时，攻占了夏都（时在斟）。

以后统治了夏境至少有六七十年。

太康逃居于外，有穷氏以次立其弟仲康及仲康子后相为傀儡。

后相继被窜逐追杀。

后来后相的遗腹子少康收聚夏朝的残余势力，乘有穷氏的衰弱，把他灭掉，恢复旧物。

有穷氏是在夏境的东北，后来灭夏的成汤则来自东南，其先世亦发祥于东北。

夏朝的外患盖常在东方。

成汤的先世累代为部族长。

他的先十四代祖契与禹同时，以蕃（今河北平山附近）为根据地。

契子昭明迁于砥石（今河北砥水流域），继迁于商（今河南商丘），“天邑商”，及商朝之得名由此。

<<中国史纲>>

昭明子相土是一雄材大略的君长，曾大启疆宇，以相（在今安阳西十五里）为东都。

可惜他的功业的记录只剩下他的后裔的两句颂诗：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此时的海外说不定就是辽东或朝鲜。

后来商朝亡后，王弟箕子能逃入朝鲜而历世君临其地，莫不是因为商人原先在那里有些根据？

相土以后两三百年来，商人的事迹无考，也许这是他们的中衰时代（传说相土发明以马驾车，又他的后裔王亥——也是成汤的先世——发明以牛驾车）。

到了成汤才复把商人带领到历史上，他从商北迁于亳，继灭了北方的若干邻族，然后向夏进攻，夏主桀兵败，被他放逐于南巢（在今安徽巢县东北五里）而死，夏朝于此终结。

我们若从夏朝再往上溯，则见历史的线索迷失于离奇的神话和理想化的传说中不可析辨了。

凡此种种，本书自宜从略。

但其中有一部分和后来历史的外表，颇有关系，应当附带叙及。

据说禹所继承的君主是舜，国号虞，舜所继承的是尧，国号唐。

当尧舜之世，天下为公，而不是一姓一姓所得私有的。

尧怎样获得帝位，传说没有照顾到。

舜本是历山（在今山东）的农夫，有一串故事（这里从略）表明他是一个理想的孝子和理想的贤兄，又有一串故事（例如他在哪里耕种，哪里的农人便互相让界；他在哪里打渔，哪里的渔人便互相让屋；他在哪里造陶器，哪里的陶工便不造劣器。

）表明他是一个理想的领袖。

帝尧闻得他的圣明，便把他召到朝廷里来，把两个女儿同时嫁给他，试他治家的能力；并拿重要的职位去试他政治的能力。

他果然家庭雍睦任事称职。

尧老了，便告退，把帝位推让给他。

尧的时候有一场普遍于全“中国”的大水灾。

禹父鲧，因治水无功，被处死刑，禹继承了他父亲的任务终于把水患平定。

禹治水的工作凡历十三年，在这期间，曾三次走过自己的家门，都没有进去，有一次并且听到新产的儿子在呱呱地哭呢。

后来舜照尧的旧例，把帝位推让给禹。

禹在死前，也照例选定了一位益做自己的继承者。

但禹死后，百姓不拥戴益，而拥戴禹的儿子启，于是启践登了帝位（一说益和启争位，为启所杀）。

旧例一破便不再回复了。

这便是尧舜“禅让”的故事。

还有一位值得提到的传说中重要人物，那是黄帝。

他所占故事中的时代虽在尧舜之先，他的创造却似在尧舜之后。

照传说的一种系谱（《史记·五帝本纪》），他是尧的高祖，舜的八世祖，禹的高祖（舜反比禹低三辈，这很奇怪），也是商周两朝王室的远祖，并且成了后来许多向化的外族的祖先。

黄帝和他左右的一班人物并且是许多文化成分的创造者，例如他发明舟、车、罗盘、阵法、占星术和许多政治的制度；他的妃嫔最初教人养蚕织丝；他的诸臣分别发明文字、算术、历法、甲子和种种乐器。

总之，他不独是中国人的共祖，并且是中国文化的源头。

他的功用是把中国古代史大大地简单化了。

第三节周朝的兴起现在让我们离开想象，回到事实。

当商朝最末的一百年间，在渭水的流域，兴起了一个强国，号为周。

周字的古文象田中有种植之形，表示这国族是以农业见长。

周王室的始祖后稷（姬姓），乃是一个著名的农师（传说与禹同时），死后被周人奉为农神的。

后稷的子孙辗转迁徙于泾渭一带；至古公亶父（后来追称太王），原居于豳（今陕西邠县附近），因受不了鬼方侵迫，率众迁居岐山（在今陕西岐山县境）之下。

这一带地方盖特别肥沃，所以后来周人歌咏它道：周原膴膴，萁茶如飴。

<<中国史纲>>

以一个擅长农业的民族，经过移民的选择，来到肥沃土地，而且饱经忧患，勤奋图存，故不数十年间，便蔚为一个富强之国。

到了古公子季历（后来追称王季）在位时，竟大败鬼方，俘其酋长二十人了。

古公在豳，还住地穴，其时周人的文化可想而知。

迁岐之后，他们开始有宫室、宗庙和城郭了。

季历及其子昌（后来追称文王）皆与商朝联婚，这促进了周人对商文化的接受，也即促进了周人的开化。

至少自古公以下，周为商朝的诸侯之一，故卜辞中有“令周侯”的记录。

旧载季历及昌皆受商命为“西伯”，即西方诸侯之长，当是可信。

但卜辞中屡有“寇周”的记载，可见商与周的关系并不常是和谐的。

旧载古公即有“翦商”的企图。

盖周自强盛以来，即以东向发展为一贯之国策。

古公和季历的雄图的表现，于史无考，但西伯昌的远略尚可窥见一斑。

他在逝世前九年，自称接受了天命，改元纪年。

此后六年之间，他至少灭掉了四个商朝的诸侯国：一、密 今甘肃灵台县西，二、黎 今山西黎城县东北，三、邶 今河南怀庆西北，四、崇 今河南嵩县附近。

此外商诸侯不待征伐而归附他的当不少。

又旧载西伯昌曾受商王纣命，管领江汉汝旁的诸侯，大约他的势力已及于这一带。

后来周人说他“三分天下有其二”，若以商朝的势力范围为天下，恐怕竟去事实不远了。

灭崇之后，西伯昌作新都于丰邑（在今长安县境），自岐下东迁居之。

他东进的意向是够彰明的了。

文王死后第四年的春初，他的嗣子武王发率领了若干诸侯及若干西北西南土族的选锋（中有庸、蜀、羌、鬃、微、卢、彭、濮等族类，其名字不尽见于以前和以后的历史），大举伐商；他的誓师词至今犹存，即《尚书》里的《牧誓》。

凭一场胜仗，武王便把商朝灭掉。

战场是牧野，离商王纣的行都朝歌（今河南淇县）不远。

朝歌是他的离宫别馆所在，是他娱悦晚景的胜地。

这时他至少已有六七十岁了。

在享尽了畋游和酒色的快乐之后，他对第一次失败的反应是回宫自焚而死。

商兵溃散，武王等长驱入殷。

商朝所以亡得这样快，照后来周人的解释是文王、武王累世积德行仁，民心归向，而商纣则荒淫残暴，民心离叛；所谓“汤武革命，应乎天而顺乎人”。

这固然不能说没有一些事实的影子，但事实决不如此简单。

周人记载中无意泄露的关于商、周之际的消息，有两点可注意。

一说“纣克东夷而陨其身”。

可见商人在牧野之战以前，曾因征服东方的外族，而把国力大大损耗了；武王乃乘其疲敝而取胜的。

一说“昔周饥，克殷而年丰”。

可见牧野之战，也是周人掠夺粮食、竞争生存之战。

武王是知道怎样利用饥饿的力量。

殷都的陷落和商朝的覆亡，只是周人东向发展的初步成功。

商朝旧诸侯的土地并不因此便为周人所有，而且许多旧诸侯并不因此就承认武王为新的宗主。

此后武王、成王、康王之世，不断地把兄弟、子侄、姻戚、功臣分封于外，建立新国。

这些新国大抵是取旧有的诸侯而代之，也许有的是开辟本来未开辟的土地。

每一个这类新国的建立，便是周人一次向外移殖，便是周人势力范围的一次扩展。

但当初武王攻陷殷都之后，并没有把殷都及殷王畿占据，却把纣子武庚、禄父封在这里，统治商遗民，而派自己的两个兄弟管叔和蔡叔去协助并监视他们。

这不是武王的仁慈宽大。

<<中国史纲>>

这一区域是民族意识特别深刻的“殷顽民”的植根地，而且在当时交通不便的情形之下，离周人的“本部”丰岐一带很远，显然是周人所不易统治的。

故此武王乐得做一个人情。

但这却种下后来一场大变的原因。

武王克殷后二年而死，嗣子成王年幼，王叔周公旦以开国功臣的资格摄政。

管、蔡二叔心怀不平，散布流言，说“周公将不利于孺子”。

并鼓动武庚、禄父联结旧诸侯国奄（今山东曲阜一带）和淮水下游的外族淮夷，背叛周室。

周公东征三年，才把这场大乱平定。

用兵的经过不得而详，其为坚苦卓绝的事业，是可想见的。

于是周公以成王命，把殷旧都及畿辅之地封给文王的少子康叔，国号卫；把商丘一带及部分殷遗民封给纣的庶兄微子启，以存殷祀，国号宋；把奄国旧地封给周公子伯禽，国号鲁；又封功臣太公望（姜姓）的儿子于鲁之北，国号齐（都今山东临淄），封功臣召公奭（周同姓）的儿子于齐之北，国号燕（都今北平附近），都是取商朝旧有诸侯国而代之的。

周公东征之后，周人的势力才达到他们的“远东”。

就周人向外发展的步骤而论，周公的东征比武王的克殷还更重要。

这大事业不可没有一些艺术的点缀。

旧传《诗经·豳风》里《东山》一篇就是周公东征归后所作，兹录其一章如下：我徂东山，惓惓不归。

我来自东，零雨其濛。

鸛鸣于垤，妇叹于室。

洒扫穹窒，我征聿至。

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见，于今三年。

假如传说不误，这位多才多艺的军事政治家，还是一个委婉的诗人呢！

先是武王克殷后，曾在丰邑以东不远，另造新都曰镐京（仍在长安县境），迁居之，是为宗周。

“远东”戡定后，在周人的新版图里，丰镐未免太偏处于西了。

为加强周人在东方的控制力，周公在洛阳的地方建筑一个宏伟的东都，称为成周。

成周既成，周公把一大部分“殷顽民”，远迁到那里。

从此周人在东方可以高枕无忧了。

却不料他们未来的大患乃在西方！

周公对被迁到成周的殷人的训词，至今还保存着，即《尚书》里的《多士》。

武王、成王两世，共封立了七十多个新国，其中与周同姓的有五十多国；但这七十余国而外，在当时黄河下游和大江以南，旧有国族之归附新朝或为新朝威力所不屈的，大大小小，还不知凡几。

在这区域内，周朝新建的和旧有的国，现在可考的有一百三十多。

兹于现在可考的周初新建国中，除上面已提到的宋、卫、鲁、齐、燕外，择其可以表示周人势力的分布的十八国列表如下：国名 姓 始祖与周之关系 国都今地 晋 姬 武王子叔虞 山西太原北霍 姬 文王子叔处 山西霍县邢 姬 周公子 河北邢台芮 姬 陕西大荔县南贾 姬 陕西蒲城西南西虢 姬 文王弟虢叔 陕西宝鸡县东滕 姬 文王子叔绣 山东滕县邾 姬 文王子叔武 山东汶上县北郟 姬 文王子 山东城武县东南曹 姬 文王子叔铎 山东定陶县东虢 姬 文王弟虢仲 河南汜水县蔡 姬 文王子叔度 河南上蔡县（约在前530年左右迁于今新蔡）蔡 姬 周公子 河南郑州东北息 姬 河南息县申 姜 河南南阳北蒋 姬 周公子 河南固始县西北随 姬 湖北随县聃 姬 文王子季载 湖北荆门东南本 节叙周人的南徙至周朝的创业，本自成一段落。

但为以下行文的方便起见，并将成王后康、昭、穆、共、懿、孝、夷、厉八世的若干大事附记于此。这时期的记载甚为缺略，连康、昭、共、懿、孝、夷六王在位的年数亦不可考（成王在位的年数亦然）。

因此厉王以前的一切史事皆不能正确地追数为距今若干年。

成、康二世为周朝的全盛时代，内则诸侯辑睦，外则四夷畏慑。

穆王喜出外巡游，其踪迹所及，不可确考，但有许多神话附着于他。

夷王时周室始衰，诸侯多不来朝，且互相攻伐。

<<中国史纲>>

厉王即位于公元前878年。

他因为积久的暴虐，于即位第三十七年，为人民所废逐，居外十四年而死。

在这期间，王位虚悬由两位大臣共掌朝政，史家称之为共和时代。

厉王死后，其子继立，是为宣王。

第四节周代与外族夏、商、周三朝的递嬗，代表三个民族的移徙和发展。

大体上说，夏人自西而东，商人自东而西，周人复自西而东，他们后先相交错，相覆叠，相同化，同时各把势力所及地方的土族同化，在一千数百年间，这参伍综错的同化作用转结成一大民族，他们对于异族，自觉为一整体，自称为“诸夏”，有时也被称并自称为“华”。

中华民国的“华”字起源于此。

这自觉和自号很难说是哪一年哪一月开始，大约，至迟在公元前770年“周室东迁”的前后当已存在。

这划时代的大变，一会就要讲到。

我们可用这时间做中心点，以叙述诸夏与若干影响重大的外族的关系。

至于其他星罗棋布于河北、山东、河南、山西、陕西而与诸夏错居的许多游牧或非游牧的种族（周人所泛称为夷或戎的）以及他们不断与诸夏互相龇而渐渐为诸夏同化吸收的经过，这里不能详及，现在也不能尽考。

（一）商末、周初的鬼方，后来周人称为玃，继称犬戎。

此族在周初屡出没于在丰镐以西和以北。

成王时曾伐鬼方，俘人至一万三千余，战争之剧烈可想。

参加此役的孟国（近岐山）曾铸鼎刻铭以记其事，至今尚存。

穆王时又大败此族，俘其五王，迁其部落若干于汾洮一带。

至厉王末年，玃乘周室内乱，又复猖獗；以后四十余年间不时寇略西陲，甚至深入王畿，逼近镐京，终为宣王所攘逐。

这期间出征玃的将士的写怀诗，至今还有留存（即《诗经·小雅》的《采薇》、《出车》、《六月》、《采芣》），兹示一斑（《采薇》六章，录四章）如下：采薇采薇，薇亦作止。

曰归曰归，岁亦暮止。

靡室靡家，玃之故。

不遑启居，玃之故。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

曰归曰归，心亦忧止。

忧心烈烈，载饥载渴。

我戍未定，靡使归聘。

采薇采薇，薇亦刚止。

曰归曰归，岁亦阳止。

王事靡盬，不遑启处。

忧心孔疚，我行不来。

（中略）昔我往矣，杨柳依依。

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行道迟迟，载渴载饥。

我心伤悲，莫知我哀。

宣王死，子幽王立。

幽王因宠艳妃，废王后及太子宜臼。

太子出奔皇后的外家，即申国。

王欲杀太子，求之于申，不得，王伐申，申侯求助于犬戎。

于是犬戎攻陷镐京，追杀幽王于骊山下。

方镐京陷落之时，鲁侯、许公及申侯拥立宜臼于申（公元前770年），是为平王。

及幽王既死，虢（当是东虢）公又立王子余臣于携（当在东虢附近）。

<<中国史纲>>

两王并立了十一年，而余臣为晋文侯所杀，周室复一。

平王因镐京及王畿的西半已为犬戎所据，定都于成周，后来王室一直留在这里。

平王把沦陷区交托给一个护驾功臣、原来承袭西垂大夫世职的秦襄公，许他若能克服犬戎，便领有其地。

襄公果然完成了他的任务，在那里建立了秦国。

而王畿的西半不复为王室所有了。

经这次打击，王室日渐衰微，到后来只保存了一个共主的空名。

史家称东迁以前的周朝为西周，以后的周朝为东周（现存鲁国史记《春秋》包括东周第四十九年以下的二百四十二年，史家称这个时代为春秋时代）。

（二）入东周后，从公元前662至595年间，为诸夏祸最烈的外族，是犬戎的同源异派，当时周人称为“狄”的。

狄有赤白之别，又各分为许多部族。

赤狄分布于今河北广平至山西潞城、屯留一带；白狄一部分在陕北延安一带，一部分在河北藁城、晋县一带。

但这时期的记载并没有分别侵略者为赤为白，或其所属的特殊部族，只笼统称之为狄而已。

大约来侵的狄人，赤狄占大多次数，东方的白狄占小数，而西方的白狄不预。

在这期间齐受狄侵七次，卫六次，晋五次，鲁二次；邢、宋、温、郑、周各一次。

卫受摧残最甚，被逼两次迁都（卫原都朝歌，在河南淇县东北；一迁楚邱，在河南滑县东，再迁帝丘，在河北濮阳），其国境大半沦陷，赖齐桓公之救始免于亡国。

邢亦被迫迁都（邢本都河北邢台，迁山东东昌），亦赖齐桓公之救始免于亡国。

成周为狄攻陷，周襄王出奔于郑，赖晋文公之救始得复国。

结束狄患的是晋国，它于公元前593至前592两年间，倾全国之力灭赤狄；继于前530至前520年间灭东方白狄的大部分。

经这两役，广漠的狄土的邢、卫的沦陷地皆入于晋，晋境盖展拓了一倍以上。

（三）周代以前，中国历史的主要地盘是在山东、河南、山西，而旁及河北、陕西的一部分。

其时长江下游包括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等地的历史，几乎完全埋在黑暗之中。

到了周朝，这一区域里民族分布的情形才有鳞爪可见。

周人的拓殖已达到湖北汉水的东北，其汉水以西南，直至大江，则为楚人的领域。

安徽境内部族之可考者有群舒，在舒城至庐江间及六安、霍丘一带；有徐戎，在泗县以北一带。

在江苏境内，江北有淮夷，以邳县一带为中心，其江南则为吴人的领域。

吴地并跨浙江的浙西，其浙东则为越人的领域。

越地并跨江西的鄱阳湖之东。

这些民族中，群舒的历史吾人所知最少，只知道他在鲁僖公（公元前659至前627年）时曾与鲁为敌，鲁人歌颂僖公，有“荆舒是怨”之语，它们自前615年以后陆续为楚所灭。

徐戎当周穆王之世，在徐偃王的统治之下，曾盛极一时；东方诸侯臣服于他的有三十六。

他晚年力行仁义，不修武备；结果，楚人来伐，他一战败死，他的霸业也随之烟消云散。

徐戎每与淮夷联合，以敌对诸夏，特别是鲁。

周公子伯禽初就封于鲁时，这两族便并起与他为难。

厉宣之际两族又乘机凭陵诸夏，至劳宣王亲征平定。

《诗经》里《常武》（《大雅》）一篇即咏此事，中有云：王奋厥武，如震如怒。

进厥虎臣，阗如虓虎，铺敦淮，仍执丑虜。

截彼淮浦，王师之所。

王旅啍啍，如飞如翰，如江如汉，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绵绵翼翼，不测不克，濯征徐国。

后来鲁人歌颂僖公的成功也说他：保有鳧绎，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蛮貊。

淮夷受诸夏同化的程度，现在无征。

徐戎至迟在东周时已采用了诸夏的文字。

这有现存几件徐国铜器的铭文为证，举其一例如下：隹（唯）正月初吉丁亥，徐王庚之淑子沈儿，择

<<中国史纲>>

其吉金，自作和钟。

中翰且扬，元鸣孔皇。

孔喜元成，用盘（乐也）饮酒，和会百姓。

淑于威仪，惠于明祀。

（吾）以宴以喜，以乐嘉宾及我父兄庶士。

皇皇熙熙，眉寿无期，子子孙孙，永保鼓之。

徐戎于公元前512年为吴所灭。

淮夷自前515年以后不见于历史，其结局无考，大约非被灭于吴则被灭于越。

楚、吴、越三国有一重要的共同点：三国的王族都不是土著，而是从北方迁来的。

传说楚王族的先祖季连，其长兄昆吾为夏朝诸侯之一，国于今河南许昌；其后嗣称昆吾氏。

昆吾氏之国为成汤在伐桀之前灭掉。

季连的事业无考。

他的后裔衰微，散在中国和蛮夷。

周文王时，有鬻熊，乃季连后裔之君长于楚地者，归附于文王。

鬻熊的曾孙熊绎，当成王末年始受周封。

吴国王族的始祖是王季之兄泰伯和仲雍（兄弟相继），传说他们因为让国给王季而逃至吴地。

越国王族的始祖相传是夏禹之后。

这些南向远徙的殖民领袖，怎样犯难冒险去到目的地，怎样征服了土人而君临其上，现在都不得而知了。

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既与本土隔绝，渐为当地蛮夷所同化。

例如居吴越的便同土人一样断发（诸夏束发，戎狄被发，吴越断发）文身。

但经过了长期的隔离之后，当这些国族的发展把他们带到诸夏的世界时，同化的方向都倒转了过来。

楚和诸夏发生密切的关系最早，自西周初期以来，便是周室的劲敌；吴次之，入东周一八五年（公元前583年）始与诸夏有使节往来；越则直待前473年灭吴以后，始有机会与诸夏接触。

楚、吴、越的历史续详于第三章。

……

<<中国史纲>>

媒体关注与评论

他立志作第一等人，终能在史学界取得第一流的地位。

他的《中国史纲》，虽仅部分完成，是他人格学问思想文章的最高表现和具体结晶。

书中有真挚感人的热情，有促进社会福利的理想，有简洁优美的文字，有淹博专精的学问，有透彻通达的思想与识见。

——贺麟 哲学家那半部书的好处，在乎能动人，文章好，而题目不多，说的透澈。

——傅斯年 历史学家若把读史比作登山，我们正达到分水岭的顶峰，无论回顾与前瞻，都可以得到最广阔的眼界。

在这个时候，把全民族的历史和它所指向的道路，作一鸟瞰，最能给人以开拓心胸的历史的壮观。

——张荫麟

<<中国史纲>>

编辑推荐

1.最快速、最系统、最经典的国史教材，了解中国历史公认的权威版本。

2.畅销七十余载，重印百余次！

彩页、插图、精装，全面超越市场同类品种。

3.一部中国人必读的通史名著。

随梁启超、吴晗、冯友兰等学界人物称赏的史学天才，读一本最通俗的中国历史，看社会变迁与文化发展的根源之所在。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